

中華世紀與王道文化對我振興民族之啟示

——為辛亥革命一世紀、民國建國一百年許願

李發強

一、前言——時代考驗民族

歲月不居、時代多變。偉大的中華民族，自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內憂外患、國脉如縷，列強侵華，日俄稱冠、奪我台澎、佔我北疆，民族自強各是其是，三民主義，應運而生，直至七七抗戰，終獲勝利。不幸又起國共內戰，使無數同胞家破人亡，在絕望與希望中掙扎。而今中共崛起，復興在望。但戰爭給人們的痛苦卻是永遠！誠如梁啟超所謂「中國乃殺伐之國，有三十年不見戰爭者，殆希」！亦如政論家陳裕清所說「二十世紀為戰爭世紀」。因思中華文化並非主張戰爭，何以戰爭如此之多。我從出生到現在，年已坐八望九，都生活在戰爭威脅

中，應該說我很是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因思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無時不在苦

思，如何使戰爭成為歷史

名詞，終於發現爭鬥是「天理與人欲」之爭，很難避免，但人類的衝突多是文化衝突的結果，如從文化入手，化衝突為和平，不失為善策。因此主張，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應是振興中華民族，創造民族幸福的最佳出路。宋儒張橫渠主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後來經國先生改為「為中國立心，為同胞立命，為文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應是和平之源。而何謂「立



心」，應是「天道」之心，何謂「立命」，應是「性命」之命，何謂「繼絕學」，應是「道德」之學，何謂「開太平」，應是「文化思想」之太平。因此，我曾自命不凡，提出以此四為，催生「王道之治」，推動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並以中華王道文化開創二十一世紀為中華世紀的主張。以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和慶賀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中華民國百年之慶許下心願，也許此願雖然需要時間，但是真理必有成功之日。時代正在考驗中華民族，尚祈高明指教。

令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讀到中華民國國家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博士（前行政院長），以「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台灣最關鍵」為題，在香港發表演說時強調：「中共崛起是不爭的事實，但能否成為十九世紀的英國，二十世紀的美國，尚須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尋求精髓，並與二十一世紀的新潮文化接軌及融合經驗，為全世界提出『普世價值』最為關鍵。」。他堅定指出，這個「普世價值」就是「文藝復興」，就是中華傳統文化，就是孟子所說的「王道文化」。劉氏的主張正是我所認定「以中華傳統文化統一中國」的

主張。這也就是建立中華世紀與王道文化，是振興中華民族的捷徑！

二、中華世紀與王道文化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受到普世的尊敬和學習。國家文化總會劉兆玄總會長所強調的接軌新潮流的普世價值，就是希望以王道文化行王道之治，能在兩岸四地受到重視與實踐，尤其指出：「中華文化在台灣，由於沒有遭到『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壞，而得較好保存；台灣數百年的歷史是一部面向海洋的移民史，也由於移民文化中先天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因而形成了文化的多樣性和創新性，這種多樣性文化的良性互動、融合的過程及經驗，成為中華文化寶貴的成分」。因此，「台灣有條件在此「文藝復興」中扮演最關鍵的「尖兵」及「催化」的角色。這也是台灣在世界文化中能做最偉大貢獻的契機，台灣人切莫錯過。」

本文的重點，在探討中華世紀與「王道文化」的普世價值，以及如何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之展望。為

易瞭解，且在此先一談中華文化的源流，並說明文化的內涵。

先說文化：教育家劉真認為「文化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也是一個極難以明確界說的名詞」。文化在中國發源很早，卻無「文化」一詞，祇是以「文治教化」代表其意義；其最早見諸文字的，是三千年前之周易賁卦所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卦所說「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等。因此可知文化在中國雖早已存在。但無成語。現在一般人講到文化，多是根據英文culture譯成，而英文culture則是由希臘文colere轉化而來，含有耕種，居住及祭祀之義。英國文學家Edward Taylor於一八七一年，提出文化之定義為「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習慣，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複雜整體。」國內學者洪長春則認為「文化是大眾認同的價值，是指心態觀點，信念態度，藝術情操和宗教意識等」。在辭海字典裡，則解釋為「人類社會由野蠻而至文明，由努力所得之成績，表現於各方面者，如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風俗、習慣

等，其綜合體則謂之文化」。

由此可知，文化始自生活、生活形成文化，一個民族奮鬥的結晶就是文化。史學家錢穆曾說：「人類今天的生活，是由昨天而來，明天的文化，更是始自今天」。這又啓示我們：人類是生活在文化中。文化好壞關係民族命脈！蔣公中正是中華文化的崇信和實踐者，他曾說：「民族文化之盛衰，乃為國家存亡之所繫，如其優良文化之喪失，則其國雖存猶亡，反之如果能保存發揚，則其國雖衰必盛，雖弱必強」。又說：「一個國家的建立，民族的復興，一定要有全國一致的共同文化」。這也就是我們重視文化為民族靈魂的道理。所謂「王道文化」，就是以「以聖為王」，「以德為治」，也就是孟子所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見孟子公孫丑章句上）的道理。

次說中華文化的源流：中華文化發源於儒、釋、道三家思想，都主張和平，但以儒家思想為主，尤其自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獨尊儒術」思想後，更是獨領風騷至今。「五經四書」是中華文化源流的寶典，

王道與中道思想是寶典中的精髓。「五經」是指詩、書、易、禮、春秋；「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孔子的著作都稱為經，孔子刪詩、編書、修禮、審樂、作易與春秋。四子書出自宋儒朱熹，朱氏自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二篇，單獨成書，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四書要旨如下：

一、「大學」為曾子(參)所作，是我國最古之政治哲學，其內容以三綱領——明德、親民、止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另有天下之達道五，是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所謂五倫是也。尚有天下之達德三，是即知、仁、勇是也。在八條目中之前五目：格、致、誠、正、修，是「內聖」功夫，後三目齊、治、平是「外王」功夫。由此又可知，大學之三綱、八目、五倫、三德，加上「天人合一」及孝道，就是以人爲本，以德爲治，可安天下，可救人類的王道政治。

二、「中庸」為孔子孫子思所作，是人生哲學的寶典，視爲儒家心傳。其言心說性，欲以天理勝

人欲。內容分爲卅一章，始於天命，終於衣錦，前半部以發明「中」字之義居多，後半部以發明「誠」字之義居多。如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的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論「誠」，是強調「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三、「論語」為孔子弟子所作，以「魯論」爲本，內容二十篇，是孔子應答學生、時人，以及學生互相討論，間接聞於孔子的話。孔子是至聖先師，他的言行，盡在論語中，是研討與效法中華文化者的寶典，如人格修養、社會、倫理、政治、哲學、自述、評論等，如言仁則「克己復禮」，言學則重在「下學上達」，言政則「先正己而後正人」，爲儒家學說最爲精實宏博之書。

四、「孟子」為孟子弟子萬章等所作，以述孔子之意，總共七篇，其要義爲：道性善、法堯舜，尊

重民權，扶植民生，重仁義，輕功利，拒楊墨，放謠辭。是一部與論語異曲同工，為儒家寶典，影響深廣。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表現民族智慧，至為優異。遠在堯舜時代，君臣交相為謀，如尚書「大禹謨」（謀議之義）所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十六字心傳，是堯舜禹禪讓時的「聖諭」，在這十六字心傳中，雖未說明寓有「道統」、「治統」與「中道」之義。但已道出中華文化「道統」、「治統」與「中道」之涵義。在人類尚在茹毛飲血時代，中華民族的先民就有如此的王道思想，心性哲思，怎能不叫西方人由衷折服！

孔子是集中華文化之大成者，但在孔孟時代，由秦漢至今，孔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思想，仍多受阻。如秦滅六國厲行暴政，焚書坑儒，是對儒家思想的反動，直到西漢獨尊儒學，推行儒術。唐儒韓愈著「原道」，強調仁義道德為先王之教，要以六經為主，禮義為法，方足言道。其道統思想，直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及後世。

有宋一代，因訓詁、詞章，受道教及佛教之影響，講求心性理氣，以儒為表，以道佛為裏之中華文化。尤其大儒朱熹，集儒學之大成，道學問，主窮理，理氣並重，對中華文化繼往開來，功不可沒。

從明末到清初以至民國時，有三位大儒，對中華文華以至國民革命，都有極大影響，是即顧亭林、黃梨洲和王船山三位是也。亭林先生治學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宗旨，反清復明，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其「日知錄」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段話對照孟子「得之丘民為天子」，以及「失其民者失天下」，若再參考荀子「竊可以得國，不可以得天下」，對照瞭解，當可明其真義。

黃梨洲先生，承陽明系統，為經世之學，其所著「明夷待訪錄」，充滿民主革命之精神，對中山先生之國民革命，頗有鼓勵作用。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為其「去無道，就有道」的革命思想。對其「主窮經，立求心」及張橫渠之禮教，都有極大影

響。

王船山先生，為清初三大儒之一，主博文，亦主約禮。王氏是道統與治統的二統論者。他說「天下有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為法統；聖人之教也，是為道統」，又說：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為治，道以天下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得，以人存道而道不亡。對後世之道統與治統思想，亦即民族文化與國家興衰，頗有影響。

三、和平發展與民族前途

「和平發展」是中共對中華民國的當前政策，王道之治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是成是敗，關係中華世紀與民族興衰。中外世事變化，都有來龍去脈，試作探討，本文前述清初三儒，黃宗羲（公元一六一〇—一六九五）、顧炎武（公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王船山（公元一七六六—一八三四），都是宋明理學大師，他們上承儒家道統，下斥二場，即「清代科（科舉）場與刑場，夾磨知識份子」，

「於科場驅士子如牛馬，於刑場屠卿大夫如犬羊」，以防漢人之強與滿人之弱，因而主張革命，爭取人權。而在上述顧、黃、王三氏之前，英國人民因反對英王暴虐已於一二一五年制定「大憲章」，繼於中古時代，歐洲為抵制政教之摧殘與壓抑，為重自由、貴人生、尚知識，掀起「文藝復興」之巨浪，對東方爭人權不無影響。同時在顧、黃、王三氏之後，義人哥倫布（公元一四五—一五〇六）於一四九二年橫渡大西洋，發現新大陸，葡人麥哲倫（公元一四七〇—一五二一），於一五二二年，航行世界一週，使航海發達。英、荷、西等國紛向東方尋求殖民地而興資本主義；繼有瓦特（公元一七三六—一八一九），於一七六九年發明蒸汽機，帶來工業革命，形成資本帝國主義，紛紛向外侵略，閉關自守的清廷，成為被侵對象，如一五五七年葡人租借澳門，是帝國主義入侵之始，繼有一八四八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一八九四年甲午割台戰爭等，使中華民族失去民族自信心，成為次殖民地，要不是列強在華爭奪勢力範圍而對峙不下，恐怕中國早已亡國。由於

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革命，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成功，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法意」等書問世，激起中國戊戌變法等，紛紛要求自強，改制及國民革命。如曾國藩之經世致用，張之洞之中體西用，康有為之托古改制，梁啟超之新民說，使中華文化面臨考驗。最後則是由中山先生，成立中國國民黨，以西方之進步思想，中國之固有思想，中山先生自己之創見，為三民主義之淵源。並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思想為中華文化之道統，作全民革命之指針，受到全民擁戴。隨後又有「五四運動」主張民主、科學之新文化運動，更有中國共產黨，受到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鼓勵，要以俄為師，在中國建立共產社會，與國民黨慘烈內戰，而於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此舉對毛澤東而言，自是空前勝利，但鄧小平對毛之功過，則以「三、七分」，並取消階級鬥爭，改革開方，建立「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受到人民擁戴，也為中華文化注入活水。

有人認為國共之爭是一場誤會，因為國共的理

想，都是社會主義，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北伐、抗戰，兩次合作，證明可以互容，如果國父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或二十年，中國的前途，會否如今日之憾，因此想到人間有許多事，有必然，也有偶然。最近看到大陸名作家金一南將軍，在其「苦難輝煌」一書中說：「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史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蔣介石的悲劇在於與毛澤東同時代」。在此也使我聯想到，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共能否生存？如果沒有韓戰，中華民國能否仍有今天？再說中共從毛澤東奪權革命，要為孔夫子穿上馬克思外衣，鄧小平「告別革命」、「改革開放」、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卻為馬克思穿上孔夫子外衣。胡錦濤主張人本、和諧、和平崛起，對台灣透過連（戰）胡會，以「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求雙贏」，回應馬英九「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而以「九二共識」、「和平發展」，為中華民族王道文化，點出希望。更經中共出版之「中華民國史」認為「國共鬥爭是不同

社會精英做出不同選擇」，已證明非以成敗論英雄。因此國共之鬥有何意義？為何不能「得魚同一喜，何必手持掉」，豈定要「不信天無二日，地無二王」，而爭個你死我活。

我為研究中華文化，敬承國父紀念館劉碧蓉博士介讀一本大陸出版的好書——「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令我高興的是這本書是由台灣海峽兩岸學者在大陸出席孫中山基金會，中國孔子基金會的論文集，他們一致肯定孔夫子和孫中山先生，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的偉大貢獻。並使研究孔學和孫學，由「險學」，變成「顯學」，何其難能可貴。他們認為：「孔子與孫中山的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他們的思想超越時空，為後人所承傳與弘揚。中華文化中極具普世意義的價值理念，在當今重構民族人文精神，在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皆有著不可低估的時代意義，因而「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探討，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又說：「文化是國家與民族興盛的根，堅守住民族文化，中國才有真正崛起的可能」，我很欣慰敬佩他們的高見，更想到孔

子思想在中國復活，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的創始人，在國共之間，中共對孫中山先生的思想，雖有誤解，但中山先生遺像能夠懸於天安門，毛澤東尊中山先生為「革命先行者」，並自稱「是中山先生的門人」，以後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主席等，都稱是中山先生的繼承人，這些事實，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弘揚，對中華民族「分久必合」，在「九二共識」下，雖有台獨攪局，但國家的和平統一理應在「王道文化」之下開花結果。

古今以來，政治是一時的，文化是永久的。當前中國因國共文化衝突而對立。；在過去如胡適、魯迅、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殷海光等強調西化。如梁啟超、牟宗三、蔣中正、錢穆、余光時、金耀基等力主兼容並包。加上前述曾國藩之「經世致用」、張之洞之「中體西用」、康有為之「託古改制」、梁啟超之「新民說」，再上承顧亭林、黃宗羲、王船山，更承宋明理學，濂溪學派周、邵，洛學派二程、關學派張載、閩學派朱熹、江西學派陸象山、明代姚江學派王陽明等，以承孟、荀至孔夫子，相信必能存

異求同，滙為舉世尊崇的中華王道文化的主流，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與中華世紀開創光輝！

四、結語——民族創造時代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明白，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是王道之治，也是廿一世紀為中華世紀的必備條件。台灣未受文革破壞，成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在台灣具有良性互動及融合經驗，對達成中華世紀有催化作用。同時中共對承繼中華道統的孫中山先生，越來越尊敬，對孔孟思想漸已接受，對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成共識。鄧氏在其政治遺囑中曾對曾慶紅、胡錦濤強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未來中國可建立聯邦制」，鄧氏所謂中國特色，也就是中華文化。胡錦濤主席所主張的「人本、和諧」，「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及其為紀念辛亥百年，所說「兩岸應共同發揚辛亥精神，振興中華民族」，並強調要「終結對立，撫平創傷」。台灣馬英九總統則籲中共「正視中華民國」，主張簽訂「和平協議」。頗有建設善意！也就是中華文化王道精神的實踐，加上

國際學者一再表示孔子思想，為世界所必需，可以說「廿一世紀為中國世紀」，已經水到渠成，對於現成的禮物，我們有何理由不予順水推舟！

至於未來的中國，我們不幸一分為二，以中國人的智慧，也必能合二為一，今天的「不統、不獨、不武」和「和平發展」、「九二共識」「終極統一」，不就是說明一個中國在望嗎？為了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我們理應「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而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西方學者杭亭頓在其「文化衝突論」中，認為「文明衝突是和平的威脅，人類必需學習共存共榮」！

從大陸張維為教授新著「中國震撼」一書，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新一輪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切說明「廿一世紀是中國世紀」應已在望，因此在此為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慶賀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為中華世紀許願，是兩岸同胞的共同使命，我謹誠摯高呼：中華世紀萬歲！王道文化萬歲！

李發強於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寫於台北